



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

鲁迅与『左联』

主 编

谭桂林

吴 康

湖南师范



鲁迅与『左联』
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

主 编

谭桂林

吴 康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与“左联”——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会 2010 年年会论文集 / 谭桂林, 吴康主编.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648 - 0542 - 5

I. ①鲁… II. ①谭…②吴…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人物研究—学术会议—文集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25.6 - 53
②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9524 号

鲁迅与“左联”——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会 2010 年年会论文集 Luxun yu “Zuolian”

谭桂林 吴 康 主编

◇组稿编辑: 谭南冬

◇责任编辑: 蒋旭东

◇责任校对: 何远翠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开本: 710mm × 1000 mm ·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72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542 - 5

◇定价: 56.00 元

“鲁迅与左联”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2010年理事会合影留念

2010年7月 湖南长沙



目 录

第一辑

鲁迅与“左联”三章	杨 义 (001)
我对“左联”的几点基本理解	
——左翼·左翼文本·鲁迅与“左联”	陈漱渝 (022)
“左翼”话语构建原则与策略的确立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话语分析	黄 健 (026)
“醉眼”中的“朦胧”	
——论鲁迅对 1928 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解构	吴 康 (034)
“左联”时期的鲁迅	
——从他 与 周扬的 根本分歧谈起	袁盛勇 (050)
蜕变的努力与“革命”的焦虑	
——鲁迅“左联”生存论	龙永千 (065)
鲁迅与“左联”的契合与分歧	蒋於緝 (073)
鲁迅与北平“左联”	靳新来 (082)
崇敬鲁迅的几位“左联”作家	陈福康 (087)
略论“左联”的“左”	王锡荣 (095)

第二辑

普罗文学的政治性和世界性

——重读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兼论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左翼文学的 同时代性	赵京华 (106)
---	-----------

角色同一与角色分裂

——鲁迅与卢那察尔斯基

李春林 (125)

1928—1934 年文学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 孙 霞 陈国恩 (145)

一道雄强壮丽的文学风景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的资源性意义 程致中 (162)

生命意义的另一种追求

——鲁迅绘画活动的特点与意义 许祖华 (172)

鲁迅为“连环画”辩护估衡

——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有关“连环画”的论争说起

..... 宋益乔 刘东方 (186)

鲁迅与五四文化精神 王晓初 (198)

杂文精神、黑暗鬼影与死火世界

——鲁迅与穆旦比较论 易 彬 (223)

30 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

——以鲁迅为例 吕周聚 (239)

论鲁迅杂文中的理解诉求 梁迎春 (250)

自我认知的难题：鲁迅小说与故人相逢叙事 刘长华 (275)

自我生存之“无”的突破

——解读《野草》中的存在之思 邓 俭 (286)

第三辑

冲绳的鲁迅语境 孙 郁 (310)

当代中文网络对鲁迅的纪念

——以 2001 年和 2006 年中文网络中重要网站纪念鲁迅的专栏为中心

..... 葛 涛 (318)

“国学热”：新世纪鲁迅研究的现实困扰 何希凡 (335)

附录 “鲁迅与‘左联’”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 2010 年

理事会综述 岳凯华 陈进武 宋海清 (348)

编后记 (356)

第一辑

鲁迅与“左联”三章

杨 义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 1930 年 3 月 2 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开成立大会, 至今已经 80 周年。80 年后还要认真地谈“左联”, 可见“左联”对于解读现代中国文学品格与命运, 具有不容忽视的本质性的价值。讲现代文学史, 不涉及其本质则已, 若涉及本质性的阐释, 就不能回避“左联”了。这本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常识。但同时应该注意到, 以当时思想文学界的第一人鲁迅为“左联”的盟主, 无疑提升了“左联”的文化档位和社会影响力, 并且通过联合创造社、太阳社而成为政治性文学团体, 在对抗统治当局的文化专制中, 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格局、审美品格和历史命运。因此, 文学史往往把 1928—1937 年这个红色潮流翻卷的年代, 事出有因地叫做“左联”十年。

“十年”这种历史时段划分, 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发展中的意义非常特殊, 十年往往成为发展中的一个坎儿, 说明中国社会与文学的转型, 处在与按部就班的修修补补迥然有别的动荡的激进时期。“左联十年”恰好处在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中段, 因而适逢其时地成了现代文学为辛亥革命进行文化启蒙的补课, 转换到为新中国的到来进行社会反抗动员的“枢纽性时代”。文学有点亢奋、有点慷慨地牺牲自己

的审美风度，而成全了自己挺身担当的政治诉求。而且这股亢奋之气在文学领域横冲直撞，强烈地宣泄社会不平之气，它由此获得一批带点“愤青色彩”的读者之时，付出了浑厚沉着的传世魅力的代价。毋庸置疑，政治性乃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强势的性格，研究现代文学而回避政治性格，或者对政治性的关联只做简单化的褒贬，或者以翻烙饼方式轻易谈论所谓“解构”或“颠覆”，痛快也许痛快矣，但总是令人感到多少有损于学术的历史感的厚重和深化。“左联”与鲁迅的命题，是牵涉着现代文学基本性格和历史命运的重要命题，它关联着文学、政治和现代性的深度解读，关联着现代文化发展的沉重体验。如果不能胜任这种体验和解读，又何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上有能力、有分量的学者？

历史是尊严的，历史因与现实发展的深度联系，而获得现代价值的尊严。对“左联”、对鲁迅的纪念和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地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关联脉络，采取开放的心态，接纳和回应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上重要而新鲜的问题。学术研究的炒冷饭，总是乏味的。《说文解字》引《左传》：“反正为乏。”“乏”字在篆体中，是把“正”字反转过来。只有摒除那些缺乏新意、缺乏兴味的套数，我们才能回归学术文化的正道。我觉得，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其二，鲁迅思想与现代国学；其三，鲁迅在接受新兴思潮的过程中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本文想就这三个问题提供一些看法，以就教于现代文学界诸位师友和同行。

初章 “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

为什么以“三章”为题呢？章的本义是乐章，“乐竟为一章”，后来引申为文章，即诗文的单元。既然现代学术史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能回避“左联”的。而且每当现代文学要认识自身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和历史命运的时候，总是把“左联”研究作为重要的学科命题。那么，我们就要认真考察文学史的这一章是如何翻开、如何定调的。在当下，就要思考如何进入“左联”，分析它的声部、旋律及现代性回响，而不是回避或弱化“左联”研究，对历史的声音充耳不闻，那样的研究是肤浅的、隔靴搔痒的。然而回顾学科的历史建构便知，20世纪50—60年代，

何尝不是高度重视“左联”，何尝不是高调地把“左联”的成立，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但那时的“左联”，还是没有充分历史化的“左联”。其多数成员出生于 20 世纪之初，此时正当盛年，或居政治体制中的文坛高位，手握重权，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刺于马下，成了阶下囚。因而对“左联”的解释，现实的政治标准往往大于历史的存在。标准大于存在，也就是主观大于客观，这是高歌猛进的历史背后隐藏着的学术悲哀。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拨乱反正，首先要解决的是“文革”中、甚至“文革”前的文学政治标准的倾斜、扭曲和崩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人生悲剧。拨乱反正的“正”，备受关注的是政治的“政”，一时还轮不上文学本体的“正”。这或许与“左联”的历史化的充分程度，还留有缺口有关。

不过，“左联”研究毕竟已经逐渐获得相对充分的历史距离了。其后“左联”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作家社团，在引入文学社团研究和政治学研究角度的过程中，获得诸多值得注意的创获，但也受到所谓纯文学视角及形形色色思潮的阐释、解构和贬抑。在“现代性”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流行术语，甚至到了几乎无人不操弄现代性腔调的时候，“左联”研究也受到了腔调的试练。于是“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在纷纭众说中，也就成了具有丰富的、甚至是多义的文化内涵的文学史命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博士生对中国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改革开放以来，1980—2009 年的 30 年间，中文期刊发表的研究“左联”的文章有 1622 篇，其中核心期刊 571 篇，高于一般被视为自由主义社团的新月派（114 篇，其中核心 38 篇）约 13~14 倍。在 21 世纪初的十年“现代性”概念大为流行的历史时段，核心期刊上研究“左联”的 124 篇文章，也比研究新月社的 10 篇文章约多 12 倍。这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除了一些“发扬革命传统”的纪念文字之外，已经开始运用学理思维，是透过“左联”、而不是回避“左联”，来透视中国新文学在这个特殊阶段的现代性特殊形态。在认真清理“左联”史料的基础上，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一是在理论方式上，考察隐藏在“意德沃罗基”（Ideologie）、“奥伏赫变”（Aufheben）、“艺术的武器，武器的艺术”，以及“壕堑战”、“韧的战斗”背后的自身现代性的存在形态和发展形态；二是以开放的眼光，考察 30 年代国际性的“赤潮”，包括“拉普”、“纳

普”和欧美部分作家“左”倾，它们作为一种国际文化生态与“左联”的思潮、创作的互动关系；三是对左翼作家作品，对当时的文坛论争、翻译及其与文化思潮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在多种维度上舒展开了，虽然良莠不齐，深浅有异，但对于真实全面地了解现代中国精神谱系的完整结构和变化过程，对于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地图，都是很有裨益的。

对于“左联”现代性以及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的考察，既要广搜细辨“左联”成员、机构、活动、决议及其内外的复杂派系较量的原始材料，在此基础上抽绎出坚实的学理和可靠的结论，又要高度关注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演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决不可如同当时在场的原创造社、太阳社某些成员那样，认为“这老头子还在老调重弹”（参看陈早春回忆冯雪峰的文章《为鲁迅代笔》）。因为讲演凝聚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对社会新旧势力较量和文学者在较量中种种变异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当时“左联”内部需要警惕的人事及思想上潜伏着危机的关切和焦虑。它的思想告诫性大于政治宣言性。鲁迅本是抱着“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甘做人梯，而加入“左联”（《致章廷谦》，1930年2月27日）。鲁迅从五四时期声称如《说唐》英雄雄阔海那样扛着黑暗的闸门，释放青年到光明自由的天地，到“左联”时期甘为人梯，催生中国英俊——他始终置身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诉求的前列。出于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和独立人格，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不是空泛地唱高调，以博取皆大喜欢，而是充满忧患，洞幽察微，发为警戒，提出拯救和发展左翼事业的方略。在新的韧性的壕堑战将要开始之时，良言入口的味道是苦中含辣的。值此艰难时世，所谓现代性能无苦辣滋味吗？这种苦辣的现代性思想，正是鲁迅在“左联”的独特价值所在。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世界上大概是找不到一种与历史不发生联系的现代性的。既然此性名曰“现代”，它就只有在时间链条上和地理方域上进入历史，不自悬于虚无缥缈的半空，才能获得有血有肉的踏踏实实的生命，若其不然，它只不过是一个飘荡无凭的幽灵。鲁迅的老辣之处，在于他冷峻地审判了这个飘荡无凭的幽灵，同时也审判了作为左翼知识者群中之一员的自己。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首先提出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么一个命题。这在与会者精神

兴奋，颇以加盟左翼为荣的现场，大概有一点令人醍醐灌顶之感。鲁迅还专门借用了—个西方术语“Salon 的社会主义者”，指称那些靠着本本来高谈阔论，或者靠着教条来冲锋陷阵的革命新生代。这种借用中的隐喻，在场的与会者，尤其是原创造、太阳二社的成员，到底有多少人于心戚戚焉，无从考证。鲁迅又举例讲了苏俄革命的“同路人”，尤其是讲了 20 世纪初南社的革命文人，“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把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清朝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从讲演整理稿这种既古典、又幽默的语句来看，它是鲁迅仔细推敲过的。鲁迅崇尚的乃是真实中国的脚踏实地的现代性，并且毫不留情地戳穿革命幻想的乌托邦的肥皂泡。在他的思维哲学里，左翼和右翼并非绝对的、凝止的二元对立，其间的相对性依据，就存在于高时空幻岂能经得住沉重现实的质疑。他由此还质疑海涅所幻想的上帝给诗人准备的糖果，而且以此讽刺某种革命文学家幻想革命成功后，有劳动阶级给他捧上牛油面包。职此之故，鲁迅在把文学现代性的思路引向真实中国的同时，增加了现代性的民间性色彩。民间性本是鲁迅文艺思想的基本维度，在时代的转换中，他推进了民间性与左翼文化思潮的融合。这既使民间性得到提升，又使左翼性得到落实。或者说，30 年代的文学左翼化，乃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民间性在遭遇政治介入后，产生了合力的逻辑延伸。

然而只要回到真实中国，就会发现，文学现代性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构成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的。它所复合的文学成分，在政治倾向上有不同的趋向，在文化雅俗上有不同的层面，在思潮渊源上有本土和外来的不同方式的借鉴。比如左翼文学较多地借鉴苏俄，自由主义文学较多借鉴欧美，但它们均不同程度地转借于东邻日本。而且这种复合型的各种成分，不是等值或均质的。文学现代性的多元成分配比，存在着主次、轻重、前后、左右的区别，形成了非均衡性的错综复杂的合力机制。其中重要的文学势力，除了左翼文学和与之接近的民主主义文学之外，还有与外来影响联系深刻的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统治势力联系密切的民族主义文学，以及与市民读者、商业运营结下因缘的通俗文学。可以说，这六种不同成分的文学力量，形成不等边的六边形合力机制，而且是

一种充满竞争或斗争的动态的合力机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合力机制中的博弈，意味着“左联”存在和发展的艰巨性，某些左翼作家“右倾”的可能性，因而也证明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深刻性。

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的统治势力虽然拥有行政资源，却未能制造出文学上的强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夸口“使几被赤色笼罩的中国文坛弥漫着青白的曙光”，只不过是精神恍惚时的一种幻觉。而通俗文学却拥有众多的读者，在“左联”成立当月开始连载于上海报刊的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制造了“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的大量粉丝，连鲁迅也在上海买了此书，远邮北平孝敬母亲。在六边形合力机制中，左翼文学虽然处在“被围剿”的情境，却在与社会历史相契合中激发出强劲的文学发展推动力。而当时比较成熟的文学作品，则由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家创作出来的为多。大概可以看出，陷身激流漩涡，过分急于告诉读者一个观念、一种未及寻思的愤愤不平，是不太容易产生精致的传世之作的。倒是那些关注潮流，却又能反思潮流的人，有可能进入历史文化的潜流和审美体验所需的从容淡定。这些道理，都是需要进入社会文化的深层细加辨析才可能通晓，绝不是漫天夸口现代性具有万国普适性的人，就能够非肤浅地、而是深入地把握得了的。面对着如此复杂多样的文学现代性构成，就连中国一个十年的构成都是六边形的动态合力机制，那么西方中心主义所宣扬的现代性普适通用的标准，就可想而知，难免是一种有缺陷的、不周全的标准。换言之，文学现代性如果有什么国际标准的话，就不应该是单边标准，而应该是多边标准，起码是东西方互为参照、互为方法，从而在反复的文化对话中形成一种尊重世界多样性的、互相取长补短的“多边现代性”。“多边”两个字，赋予现代性深刻的活力，或称为“多边互动的活力”。

中章 鲁迅与现代国学

对当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就绕不开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国学热”是一个文明古国在重新复兴时期被激发出来的民间热情在文化认同上的反映，其中也许夹杂着几分虚热、几分真诚，逐渐衍变成为当代中国众所瞩目的文化景观。考虑到鲁迅是现代中国

思想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存在，鲁迅研究是不能不回应这股热潮所带来的新命题、新挑战和新的历史契机的。研究应该在挑战与回应，获得开拓的活力，获得更高层面的文化自觉。当思想要把握时代的时候，鲁迅在一百多年前，即 20 世纪初就强调文化自觉：“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这种“审己”与“知人”并重的双向思维，使鲁迅趋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于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摩罗诗力说》）的文化革新通则。这已是众所熟知了。文化思想的多维形态和基于革新通则的文化选择，使思想者在自身知识个性和时代思潮的推演下，显现出学术认知和文化策略的不断分裂与整合。在那个充满动荡和危机的历史时代，文化分裂的痛苦和整合的艰难，使鲁迅的精神长期处在历史中间物的不稳定感，处在对固有传统的鬼魂的深刻质疑，以及对外来文学魔鬼性的热切追问之中。他的思想带有一个文明古国在苦战危机、焦虑新生的时期，忧之患之，顽强地穿透浓重阴影而闪射出来的异彩。

既然鲁迅的文化思想具有分裂整合的复合性，我们考察鲁迅与国学的关系，也应该采取与之相应的双线思维：一方面以他的专门研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基本材料，把握其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他不是一般的专家教授，而更重要的是思想者和作家，因而考察其创作，连同小说、杂文、书简中关于国学的批判性笔墨与专门著作之间的紧张关系。鲁迅是在高等学府开设小说史讲席的第一人，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超越了文学史的思想史意义。中国小说自来无史，有史则自鲁迅始。在此有无之间，鲁迅汲取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以为小说立史的思想方式，推动了中国固有的“经史子集”知识结构和价值结构向现代学术分科的转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学史纲要》，它直逼文学的发生和诸子学术，重释国学的根源与核心问题，讲究知识根底，注重文化抉择。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 1926—1927 年南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讲“中国文学史略”课程的讲义稿，从先秦讲到两汉，其中的文化抉择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文学起源上推崇民间性。整部纲要把学术逻辑起点放在第一篇的“自文字到文章”，这种不是从儒家经典讲起的篇章结构，意味着中国学术的知识重组和价值转型。这里体现的思想，在鲁迅的文学思

想中具有贯穿性，他 1934 年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的《门外文谈》就是专门疏解和发挥这种文学的民间口头起源的思想的，乃是其得意之作。《纲要》第一篇揭示初民以声音姿态表达情意，变而发为言辞谐美的歌咏，口耳相传，又融入巫风歌舞。其中援引了《吕氏春秋·古乐》“昔者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所有这些都在七年后的《门外文谈》得到透彻而幽默的演绎。把文学起源的立足点放在民间，这就打破了文体的源头尽在五经的传统观念，从知识结构上以“四野之学”破解“四库之学”的封闭体系，无疑是具有文学本体论和价值论上深刻的启示性价值的。二是对先秦诸子的选择性评述。《纲要》的先秦部分，没有为孔、孟、荀设立专篇，而为“老庄”、“屈原及宋玉”设立专篇，把其他诸子插叙于其间，而不及韩非。这就印证了他在开讲这门课程前后所进行的文化自剖：“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并不相干。”（《写在〈坟〉后面》）这种与“古老的鬼魂”的对话，转换为《纲要》中的学术表述，已经出现参差，多少显示出抑儒扬道的倾向。比如《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纲要》却说：“当时足称‘显学’者，实只三家，曰道，曰儒，曰墨。”不仅变二为三，而且以道家居显学之首，进而盛称“文辞之美富者，实唯道家”，为此把“老庄”列为论述先秦诸子的唯一的专篇。其中言老子，称其“博见文典，又阅世变，所识甚多”，“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参看二十年前青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认为“欲致人同归于朴古，老子之辈，盖其梟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撓人心，则必先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并以“进化如飞矢”的进化论，批评其“逆飞如归弦”的反动，只须略为比较，就可发现，《纲要》已展示了老子学说的另一个较为平正的侧面。

对于庄子，这里已概括出他“以大归于‘混沌’，其‘不遘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其中不排除包含有鲁迅自我思想解剖的结果，也预示着他在“左联”时期批判庄子的某些锋芒。但是《纲要》的侧重点，依然在于赞扬庄子“其文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似乎意犹未尽，在接

下来的“屈原及宋玉”篇的开头，又说：“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这里诗文以庄屈并称，又说庄子“蔑视诗礼”，都是正面着墨的。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纲要》中，老庄与屈宋分别成篇，在老庄篇的两千字中，间插进来的孔子只占 85 字，墨子只占 55 字，孟子由于称赞其“叙述则时特精妙，如堽间乞食一段”，占了 300 字左右。荀子则夹载于屈宋之间。这种篇章布局所体现的文化选择，已经突破了经史子集的知识系统，使文学存在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从而给中国传统学术注入新的生机。

文化选择是一种历史性的行为，它是把文化当做动词来处理的，呈现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战略。时间性在这里发挥着非常关键的导向作用。鲁迅思想中反名教道统的异端性，与其少年的经历及后来的社会观察存在着深刻的关系。1935 年他所作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并不是就孔子谈孔子地进行静态的观察，而是将孔子这个巨大的历史文化存在，置于“现代中国”这另一时空维度进行动态的评判。方法为时间维度所改写。少年读经、做八股的那一套，无异于把人的活泼天性套在两千年前一个老头子的说教之中。其后看到了袁世凯恢复祭孔，江浙军阀孙传芳复兴投壶之礼，山东军阀张宗昌重刻十三经，还招了个姓孔的女婿，一幕幕拿孔子当“敲门砖”开历史倒车的丑剧。有鉴于此，鲁迅就觉得 1935 年日本重建最大的孔庙“汤岛圣堂”，而中国政府军阀纷相祝贺，简直在表演着一场二十年间相互映照的滑稽戏。基于他的民众本位意识，他感叹：“中国民众对孔子是恭谨的，却不亲密。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些论说，都是贴近现实政治的。现实政治一层又一层地给历史人物涂上了滑稽的色彩，使后人在嘲笑色彩滑稽之时，失落了对真实历史人物理解的同情与深度的认知。

文化战略，说到底，先要解决文化主体的生存权。离开这一点，其他都无从谈起。思想启蒙提醒人们，落后挨打的文明古国需要奋起拯救，而现实政治却使人们在反复受到作弄中，挫伤了从本土主流的传统文化中自谋拯救道路的信心。对于五四那代先驱者来说，推倒传统文化偶像，开拓文明更新之路，成为他们文化战略的时代选择。因此，那代先驱者中对于

作为传统文化偶像的孔子，因现实的教训而失去恭敬，也属时世所迫，不难理解。1933 年鲁迅给以提倡幽默著称的《论语》杂志，写了一篇题目就非常打眼的杂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他自称是“‘学匪’派考古学之一”，把女人脚与孔夫子放在一起谈论，未免有失恭敬。

原因在于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论战时，就被指为“学匪”；后来与新月派理论家论战，又称对方“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的气味”。他甚至写了《学界的三魂》，认为国魂也有三魂：官魂，匪魂，民魂。他运交华盖，甘愿与被逼相率为盗的小民为伍，而自认“学匪”，表现出一种敢于扛着黑暗闸门的刚毅精神。他两年后的那篇戏称“学匪派考古”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感，就从《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的饮食讲究中，“考出”孔夫子有胃病。理由是“盖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笔锋杂糅古今，写成旷世奇文。那种不向圣人鞠躬的态度，与《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称“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这类话，是一脉相通的。文中讲了他到山东旅行的感受：“在为道路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些话虽然不甚恭敬，却也给古老的偶像吹进了一股活人气，比起一味的顶礼膜拜来，具有颇为难得的自由感。鲁迅以他独有的幽默，使圣人比起那些专门在他的头上戴高帽的做法，变得更像一个活人。

鲁迅在五四启蒙运动以来的非儒家，以及在“左联”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之际的非道家，尤其是非议道家退让和泯灭是非的思想，都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文化战略的特点，而不是经院哲学的特点。穿越漫长的历史时光，又面临严峻的现实危机，古代智者的原本形象已被历史和现实的螺旋式运转切割成碎片。每个历史过客都无妨捡起若干碎片，抒写自

己的思想发现。而历史碎片，只不过是借以折光的反射镜。反射镜的折光不仅在于镜片本身，更带本质意义的，是光线投射的角度。对《故事新编》的篇目略作编年便知，全书 8 篇写了 13 年，而在 1934 年 8 月至 1935 年 12 月的一年多时间就写了《非攻》、《理水》，以及《采薇》、《出关》、《起死》等 5 篇。较之以前的十余年，写作计划性明显增强，所展开的寻找中国脊梁和批判柔弱退让思想的两条文化线索更加明晰。他是在借历史故事来演绎自己的文化战略和思想发现。鲁迅常说这种手法有点“油滑”，实际上他以乍看为游戏笔墨，却内蕴着犀利思想锋芒的叙事策略，从古人古事捡来一些碎片，糅合着一些当今世态的泥巴，摔破搓揉进自己的思想，合成一个四不像的泥娃娃。这就是他独具一格的“碎片的折光”艺术。

《出关》开头让主人公亮相，就是：“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孔子拜访他，谈自己“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本是汉代才有定说的儒家经籍名目，也提前使用了；孔子走时上了车，“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孔子问礼于老聃时，三十余岁。而冉有比孔子小 29 岁，孔子是 55 岁去鲁适卫，周游列国时，才让冉有为仆驾车的。至于孔子见老子时，冉有才几岁，怎么能“都”的一声，挥鞭驾车上路？可见《出关》多用游戏笔墨，把老子符号化为“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认为“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关）去”（《致徐懋庸》，1936 年 2 月 21 日）。这样的文学老子的形象，当然不宜当做完整真实的老子来对待，鲁迅也无此意思，他只不过是漫画化了的历史碎片，折射出来的乃是鲁迅对空谈误国的针砭，提倡的是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

《起死》捡来《庄子》杂篇《至乐》中的碎片，搭配上司命神，又搭配上当时警察局的巡士，围绕着道冠白须的庄子，表演了一幕荒原骷髅的荒诞剧。表演间杂着莫名其妙的道教咒语，以及亦庄亦谐的戏曲唱念，如鬼魂对庄子就唱念着韵语：“庄周，你这糊涂虫！花白了胡子，还是想不通。死了没有四季，也没有主人公。天地就是春秋，做皇帝也没有这么轻松。还是莫管闲事，快到楚国去干你自家的运动。”庄周让司命神复活死于商纣王时期的一具骷髅，引来赤条条的汉子向他索取已是无影无踪的衣